

中国民俗元典注评丛书

趋吉解读

王玉德 编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国家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员会“八五”研究项目

责任编辑/覃琼送

封面设计/朱俊杰

责任校对/苏兰清

责任印制/余秀玲

●中国民俗元典注评丛书●

QU JI JIE DU

趋吉解读

王玉德 编著

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 行	广西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广西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5363-3463-X/K·50

定价:19.00 元

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

刘守华

本世纪90年代初，日本学者、东京都立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渡边欣雄来到中国北京、天津、武汉等地进行学术交流，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有两位青年教师王玉德、杨昶，陪同渡边教授拜会了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在钟老先生的书房里，这位中国民俗学的泰斗向来访者讲授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有关民俗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其中提到：“马克思说，一切的科学都是一种历史科学。一切事物有其历史性，用历史的观点分析问题，是学术研究的一种角度。”又说：“历史溯源法是民俗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因此，我们既要加大田野调查的力度，又要注重挖掘和整理研究有关民俗的古文献。……中国在现代意义的民俗学之前，文献上有许多关于民俗的记录，也有关于民俗理论的考察，而且相当丰富，有些在世界上来讲也是比较精彩的。”钟老先生睿智的见地和通达的大师风范，使来访者获益良多。

华中师范大学有一个以我牵头的跨学科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其成员中姚伟钧、杨昶、王玉德等人以研究整理古文献见长。他们在领悟钟先生的教诲后，开始把视角伸向民俗文献领域。在取得一些初步成果的基础上，他们以“中国民俗文献整理与研究”为课题名称，向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申报，经众多专家评审，列入规划项目。以上便是这套《中国民俗元典注评丛书》的缘起。

“元典”这一命题，是著名文化史家冯天瑜教授在《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天瑜说得好：“并非一切古老、重要的书籍都可以视为‘元典’。只是那些具有深刻而广阔的原创性意蕴，又在某一文明民族历史上长期发挥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方可称之为‘元典’。”文化元典是用典籍形式将一个民族的“基本精神”或曰“元精神”加以定型，使该民族文化的类型固定下来，并对其未来走向产生至远至深的影响。文化元典因其首创性、涵盖面的广阔性、思考的深邃性而成为该民族垂范久远的指针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还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老子》、《庄子》被道家 and 道教奉为《道德经》、《南华经》；《墨子》被门徒析出数篇冠名《墨经》。一些专科创始之作，也被尊为该学科的“元典”，如以“兵学圣典”称《孙子兵法》，以“医学之宗”称《黄帝内经》，连陆羽的茶学专著也享有《茶经》之尊。作为中华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也有其原创之作，这些原创之作便是名符其实的“中国民俗元典”。例如丛书之一《神仙解读》，选录了有关华夏神仙的代表性文献——《东皇太一》、《湘君》、《三神山》、《列仙传》、《神仙传》、《拾遗记》、《搜神记》等典籍，对赤松子、老子、彭祖、张道陵、左慈、于吉、八仙、财神、福神等几十位神仙的民间传说作了注评，为研究这方面的民俗信仰提供了可靠的原始文字资料，使华夏神仙世界的建构、特色、变迁有了一个明晰的脉络。

同样，丛书中拟先出版的其他几部书稿，均贯穿着“元典”精神而为研究中国民俗提供原创性文献，对这些领域的学术探索

不无裨益。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民俗方面的内容，经过丛书作者们的精心整合辨析，疑误得以澄清，困惑涣然冰释，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件优质的“前期工程”，敷设津梁，嘉惠学林。

二

挖掘和整理民俗元典，其目的绝非嗜奇猎异，而是清理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轨迹乃至阐释中华文化纷繁系统的需要。

按照文化学家的意见，人类所进行的种种社会实践活动及其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都属于广义的“文化”。它涉及的范围十分广大，层次也不单一，正如钟敬文先生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干流。首先是上层社会文化，从阶级上说，即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其次，是中层社会的文化，城市人民的文化，主要是商业市民所有的文化；最后，是底层社会的文化，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这三种文化，各有自己的性质、特点、范围、结构形态和社会机能。”（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第3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民俗是民间文化的一部分，它是处于中下层地位的人民大众所创造和享有的生活文化。由于它是紧贴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形态，因此常常构成民族文化的基础和主体部分之一，给予社会生活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往一些思想史和文化史著作，常常只着眼于以少数“文化精英”来代表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对于广大民众所创造和享用的这种民俗文化——生活文化关注甚少，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随着民俗学的兴起，这种局面已有很大改变。（见刘守华主编《文化学通论》第193页至23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如近期间世的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就有意识地打破了“思想史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的旧框架，而给予支配广大民众的“一般知识、思想与

信仰的世界”以特别的关注，以新的理论探索受到学人的好评。它对我们从事民俗文化研究也颇有启发。

因而，这套《中国民俗元典注评丛书》所涉及的文献，虽非“思想精英”撰述的“经典文本”，但也是建构全新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原始依据，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排斥它们。脱离中国民俗及其元典来演绎中华文化系统，只可能得到一个残缺而不完整的框架。

三

民俗是各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地理、文化等条件下不断选择和凝聚的结果，它一旦形成，就成为一股强大力量，制约着生活于其中的各个社会成员，从王公贵族、文人学士到市井小民、贩夫走卒。即使是那些历史的“精英”人物，也难摆脱文化的影响。

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这样的千古名帝，文韬武略，开基拓宇，堪称一世之雄，但神仙信仰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并不逊于经世牧民的志向。秦皇遣使出海求长生不死之药，汉武“信惑神怪”欲亲自入海访求仙山，唐宗服食丹药竟死于蕃僧配制的“秘剂”，均惑于方术之士的虚诞妄言，干出种种荒谬之事，留下千秋笑柄。

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然而根据《论语·泰伯》记载，他曾极力称赞夏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季氏》所叙孔子主张“君子有三畏”，第一条就是“畏天命”。

近代启蒙思想大师严复，被推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他译著《天演论》，举西方文明以振起国人。由于他曾留学欧洲，所拥有的科学文化知识，远非传统士大夫所可比拟。然而，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如此明智的新型知识分子严复，竟惑于星相、拜神

和择吉（详见王玉德、杨昶：《论严复的神秘观》，《华中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事实上，严复所受的西方文化科学的洗礼，并不能完全抵消传统民俗的惯性作用。诚如民俗学家张紫晨先生在《中国巫术》（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一书中所说：“在人类认识的文化进程中，一切发生过的意识形态，都在人们精神史上不断凝聚成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人们潜在心态的影响往往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即使发生重大的革命，也只能改变某些心态，而不能改变全部心态。长期的农业社会，小农经济，长期的封建体制，长期的习惯势力，长期的文化心态，还被带进新的社会之中。它们还牢固地蕴藏在人们的心底。”可见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严复的思想观念并没有与某些传统陋俗一刀两断。

南北朝时的刘勰说过：“风有厚薄，俗有淳浇，明王之化，当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刘子》卷九）社会要进步，先得正风俗。欲使风俗正，须兴民俗学。民俗学在世界各国已有了长足发展，中国民俗学也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民俗学方法强调“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鲜活资料，自然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民俗文化具有时空延续的鲜明特征，诸多民俗事相并非空穴来风，大都源远流长，“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而中国古代的民俗文化资料却无比丰饶，它们同样是古人进行“田野调查”积累的成果。这是中国从事民俗学研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值得我们引为自豪。实行“田野作业与民俗文献研究的结合”，已成为中国民俗学家的共识（见叶大兵：《论田野作业和文献研究的辩证关系》，《民间文学论坛》1995年第2期）。在古代民俗文献资料的清理开掘上，广西师范大学的欧阳若修教授主编了一部《中华古俗类典》，我曾应邀审订书稿，该书采取分门别类摘编文献资料的体制，以涉猎“广博”见长。华中师范大学一批风华正茂的学者编撰的这部《中国民俗元典注评丛书》，则以选材与注

评的“精当”而取胜。

这套丛书，不仅对专业文史工作者和一般文史爱好者来说，是内容丰富多彩、观点科学严谨的参考书；而且对广大读者而言，也是不可多得的民俗文化启蒙读物。民俗文化根植于广大民众之中，过去由于缺乏正面引导，使得一些不良风俗给社会文明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丛书的“导论”和“注评”力求矫正以往的偏颇，引导读者对民俗文化建立起正确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丛书将为弘扬中华文化发挥积极的作用，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多年来，我与姚伟钧、杨昶、王玉德诸君共事合作，切磋学术，交流心得，深为他们治学的勤谨所感动。值此书稿付梓之际，遵嘱撰述本人浅见以为“总序”，言不尽意，尚祈读者鉴谅。

目 录

导 论	(1)
《曲礼》	
导 读	(25)
曲 礼	(26)
〔东汉〕王充：《论衡》(选)	
导 读	(32)
《辨崇》	(32)
《讥日》	(42)
〔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导 读	(53)
原 文	(54)
〔清〕李光地等《星历考原》	
导 读	(85)
《星历考原》卷一	(88)
《星历考原》卷二	(133)
《星历考原》卷三	(157)
《星历考原》卷四	(193)
《星历考原》卷五	(223)
《星历考原》卷六	(250)
佚名《历学会通》	
导 读	(277)
原 文	(278)
后 记	(331)

导 论

时间与择吉

人类就要结束 20 世纪的百年历程了！回眸历史，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科学与迷信、民俗与教化，倍受关注！有人说：在活着的科学家中，最杰出的当数美国的霍金，他写出了《时间简史》这部有关时间的著作，他是继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后，在时间学说方面最有成就的学者。

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特别重视时间，并且还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可惜我们当代中国学者几乎无人研究这个课题，以致于在这方面是个空白。我们愧对祖先！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尚书·尧典》就提出“敬授人时”。尧时的羲和就是测定太阳的专职官员，以便掌握时间。尧的后继者舜提出“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见《舜典》）到了周代，无论政事，还是农事，都严格依据天时，《周礼·地官》说：“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时事。”春秋时的哲人总结经验说：“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左传·文公六年》）

为了掌握时间，中国人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发明了独特的天文学体系和二十八宿，绘制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东汉就有了水运仪象台。中国先哲在测定回归年长度、测定交食周期、测定交

点月长度、测定黄赤交角、实测物候等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为什么中国先民如此重视时间？因为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国，农业对天时依赖性大。不重视时间，就是自取灾殃。

关于时间，中国先民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但是，择时观念长期与民俗、与术数、与吉凶预测联系在一起，具有很浓的神秘性。“六经之首，群艺之源”的《周易》提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史记·天官书》：“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这就使时间打上了方术烙印。

在先民看来，时间与吉凶这两个概念是人体与影子的关系。时间被神化，《尚书·益稷》说“敕天之命，惟时惟几”。时间就是天命，不得违忤。圣王法天以立教，以时为宪。所以，《淮南子·要略》反复强调恪守时运：“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

择时意识，在民俗、农事、建筑、征战、医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试以医学为例：

祖国医学以朴素的系统思维看待疾病，认为人体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有关系，自然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年、月、日、时，自然环境对人的作用亦不同。因此，人们应依据时间规律而选择生活方式，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择时的论述，在祖国古代医书中比比皆是。如《黄帝内经素问》卷一《四气调神大论》指出：“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指出：“善摄生者，无犯日月之忌，无失岁时之和，须知一日之忌，暮无饱食；一月之忌，晦无大醉；一岁之忌，暮无远行；终身之忌，暮无然烛行房，暮常护气也。”在古代医学家看来，时间是一个变数，如果人不能顺应其

变，违背了自然规律，人体就会不适，倒霉的事就会发生。孙思邈在《千金宝要》卷六举例说：“四时之气皆能为病，其伤寒尤重，以其杀厉之气故也。辛苦之人，春多患温病，以冬时多触冒寒冷所致。时行之气，犯之多病。所谓时行之气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冷，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

有人认为传统医学用现代医学理论得不到科学解释，因此，《黄帝内经》等古代医书皆属荒唐不稽。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医学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对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作出过巨大贡献，中医的择时论有极大的合理性。择时医学应成为当代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如果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指导养生和治疾，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人生在世，谁不希望平平安安，趋吉避凶，逢凶化吉。传统医学以趋吉为方向，以择时为手段之一，有待于人们重新认识和发掘利用。

广义的择吉与狭义的择吉

择吉的定义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迷信，有人说是禁忌方法，有人说是术数。《辞海》和《辞源》的“择吉”条解释为“择定吉日”。

笔者认为择吉有广义和狭义之区别。

先谈广义的择吉。

择吉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俗，一种心理和行为趋向，一种对时间的认知，一种对信息反馈的决断，它是有经验成分、科学成分、迷信成分、众多知识成分的文化现象。广义的择吉不限于日期，吉的内容很宽泛。《说文》：“吉，善也，从士，从口。”《逸周书·武顺》：“礼义顺祥曰吉。”可见，善、顺之事都是吉。

择吉就是要回避或清除不吉的因素。《聊斋志异·潍水狐》记载：“我将久居是，所以迟迟者，以涓吉在十日之后耳。”所谓涓吉，就是择吉。涓，本意为细流，引申为清除。

择吉的观念或许与人类社会相始终。早在原始社会，北京山顶洞人就在死者周围撒上一圈赤红色铁矿粉，这种行为不会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原始人以红色代表火，火代表生命旺盛，代表驱赶黑夜和邪恶，代表吉祥的运气和光明的未来。以红色代表吉祥的观念，这种情况一直保存到后代。皇帝的宫殿陵寝、佛教道教庙宇都以红色为装饰色，民间风水以红色镇邪，都沿袭了原始择吉观念。

原始社会的人还盛行图腾崇拜，氏族以龙、凤、虎、狗、牛等为吉祥物，认为它们与本氏族有某种神秘的默契，可以保佑本氏族。王充在《论衡·初禀》说：“文王当兴，赤雀适来，鱼跃鸟飞，武王偶见，非天使雀至白鱼来也。吉物动飞而圣遇也。”可见崇拜动物也是择吉行为，它给古代先民以心理上慰藉。

古代择吉的形式很多：

择物，佩物择吉，以玉佩、石佩戴在身上，用以美饰和避邪。《山海经》记载有个招摇山，山上“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谷，佩之不迷。……丽膺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瘦”。二几千年前的人就知道把大自然中的东西佩戴在身上，可见这种择物求吉的习俗是多么悠久，难怪现代人仍喜欢佩戴护身符或金玉之器！

择吉土，选择地点。《礼记·礼器》：“因吉土而享帝于郊。”《注》云：“吉土，王者所占而居之土也。”先民以占卜的形式选择适合居住的地点，为的是吉多凶少或无凶无灾。

择善言。善言即吉言，听了对人有益。善言不是恭维话，而是有利于人们进步的劝告。《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去恶从善，是谓

趋吉。

择友邻。战国时孟母三迁的故事，脍炙人口。孟子有了好的环境，使他能很快成长。《史记·苏秦传》说得好，“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吉利的友邻环境，正是人们渴求的，为的是减少不测因素。

民间择吉，必得避凶，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避凶的方法有很多，如口念咒语“元亨利贞”、“姜太公在此”、“阿弥陀佛”等，在调整心态上有作用。有的人在宅前屋后置桃符、铜镜、石敢当，这也是自己安慰自己。有的地方举行傩仪、祭祀，求助于神，最终目的还是求吉。

再谈狭义的择吉。

古代的择吉，主要是指择日。方术的择吉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吉凶神煞为推算依据，选择吉日吉时，确定趋避。狭义的择吉又称为涓吉、諏吉，它不是孤立的方术，仍与太乙术、六壬术、奇门遁甲术、堪舆术、占星术紧密相连。

先秦时代已很流行选择吉日。民间以每月初一为吉日。《周礼·天官·大宰》记载：“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诗经·小雅·小明》记载：“二月初吉，载离寒暑。”

秦汉有专门为民众和朝廷选择日子的方士，称为日者。司马迁在《史记》写有《日者列传》，这说明当时的日者在社会上很活跃，有较大影响。到了明代，择吉家仍被称为日者，陶宗仪在《辍耕录·日家安命法》说：“日家者流，以日月五星及计罗炁孛四余气躔度过宫迟留伏逆，推人之生命月日时，可以知休咎，定寿夭。”人们在于任何事情时，除了空间就是时间，在什么时间适宜干什么事？日者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中国古代举行大事，没有不选择日期的。选择日期到底有没有好处，先民不太理会。在他们看来，选日总比不选日好，相信民俗总比不信好，何况选了日期可以调动民众信心，并且还有一

些成功的实例在先，何必不选吉日呢？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成功了，甲子日就成了吉日，所以，在农历上的甲子日是百事咸宜。

择日之所以必要，这与诸多的日期禁忌有关。如父母的去世日，皇帝的去世日，禁止饮酒狂欢，禁止婚娶。民间在九月初九流行“登高以避凶”的活动，传闻起源于桓景与费长房的故事，见本书《荆楚岁时记》。每一种禁忌，不一定有道理，或者还很荒唐，但都有来龙去脉，随着许多人采纳这种禁忌，成为共识，就成为了普遍的民俗。

择吉元典

接下来要谈谈择吉元典。

谈到择吉元典，不能不提到新发现的考古资料。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地虎秦墓发掘了大批秦始皇时期的竹简。经整理，确定其中有许多前所未知的文献，如《日书》（甲种）、《日书》（乙种）都是久已失传的择日趋吉文献，并且可以称之为择吉方术的元典。

《日书》（甲种）记述了秦国和楚国的月份，保留了楚国月名的特殊叫法，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秦楚月份的对应关系。当时已用十二支表示十二时，如“日出卯，食时辰”、“下市申，春日酉，牛羊入戌，黄昏亥”等。

秦竹简错乱多，字迹残缺，现在很难卒读，尚有待考证整理，因此，本书没有选择《日书》作注评。

此外，考古工作者在汉代墓葬的竹简上也发现有关择日的资料，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元光元年（前134年）历书，竹简文字有农历节气和三伏凶日，涉及吉凶预测。但是，这些材料都是只言片语，不成文章，所以也没选录于此书。

对于元典，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元典就是某类经

典的第一部书。有人认为元典的涵义可以更广泛一些。元，文字学的意思有开始、善、原来、玄。笔者在注评择吉元典时，选目侧重于有代表性的典籍。在每篇注评之前都有导读，简述了该书该篇的情况。这里，对其他的有关选时择吉书作简要介绍。

1. 《夏小正》

中国先民很注重生态与灾异的时间性。不同的年份、月份，生态就出现不同的物象，人们必须按照生态的规律办事。至迟在四千年前成书的《夏小正》就是最早的农家月令历书，它被收入《大戴礼记》。《夏小正》按夏历十二月的顺序讲述每月的星象、物候、农事及文化。全书仅 473 个字，但史料价值很大。《史记·夏本纪》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可见先秦学者已很重视这部古老的月令。

《夏小正》所述月令如下：

正月：启蛰；雁北向；雉震响；鱼陟负冰；农纬厥耒；初岁祭耒；囿有见韭；田鼠出；獭祭鱼；鹰则为鸠；初服于公田。

二月：初俊羔，助厥母粥；绥多女士；万用入学；荣莖采繁；昆小虫，抵蚳；来降燕，乃睇；有鸣仓庚。

三月：参则伏；摄桑；委阳；颁冰；妾子始蚕；执养宫事；祈麦实；越有小旱；田鼠化为鴽；鸣鸠。

四月：鸣杞；囿有见杏；王芡秀；越有大旱；执陟攻驹。

五月：参则见；浮游有殷；鵙则鸣；初昏大火中；煮梅；颁马。

六月：煮桃；鹰始挚。

七月：秀藿蓂；狸子肇肆；湟潦生苹；寒蝉鸣；时有霖雨。

八月：剥瓜；玄槁；剥枣；丹鸟羞白鸟；辰则伏；鹿人从日。

九月：主夫出火，陟玄鸟蛰，荣鞠树麦。

十月：豺祭兽；黑鸟浴；玄雉入于淮为蜃。

十一月：王狩；陈筋革；陨麋角。

十二月：鸣弋；元驹贲；纳卵蒜；虞人入梁。

以上文字过于简扼，颇难解释。但大致可以知道飞禽走兽在当时的生活规律；亦可知道农夫们每月忙碌的事情；还可知道贵族们的祭祀和赏赐活动。如“初岁祭耒”“初服于公田”“万用入学”“颁冰”都是与文化有关的事项。以“万用入学”为例，当时选择仲春月的丁亥日为吉日，乐官练习干戚舞，献于大学，作为一种庆典活动。

如果说《夏小正》载录的是夏朝月令，那么，反映周代月令的当推《诗经·国风·七月》。《七月》描述的是豳邑（今陕西邠县西）一带的农事和文化，沿用了夏历（周历建子，夏历建寅），按月叙述，如：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六月食郁及薺，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七月》没有《夏小正》系统，但却有文采，朗朗爽口。全诗八章八十八句，是采诗者根据民间流传的诗歌改编而成。《夏小正》与《七月》之间有什么关系，到底谁先谁后成书，都值得今后探讨。

由《夏小正》开创的月令体裁农历书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东汉崔寔撰《四民月令》、唐末韩鄂撰《四时纂要》都是按月叙述天文、气象、占候、种植、修造等，指导农民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此外，宋代有《岁时广记》，元代有《农桑衣食撮要》，明代有《便民图纂》，清代有《沈氏图书》。近代以来的农历书，大抵是这些月令书的延续。